



国学经典导读

徐江雁 张大伟 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国学经典导读

徐江雁 张大伟 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国学经典导读》编写人员

主 编：徐江雁 张大伟

副主编：周发祥 贾成祥 杨金长 李东阳 彭 新

编 委：陈玉龙 李东阳 李俊枝 张大伟 周发祥 杨金长
张晓利 赵东丽 贾成祥 徐江雁 崔发展 彭 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学经典导读 / 徐江雁, 张大伟主编. -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215-07246-6

I. ①国… II. ①徐… ②张… III. ①传统文化 - 中国 - 中
医学院 - 教材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66630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65788018)

新华书店经销 巩义市鑫祥票证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5.5

字数 300千字 印数 3000册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编辑邮箱: yongjunL@sina.com QQ: 1169129189

定价: 25.00元

序

大学生应当有读懂国学经典的基本训练，我们只有通过一句一句地读，才能走近经典，进而与古代的智者、圣人、先知，作平等的心灵交流与思想对话。华夏族群在数千年的融合与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存体验、宇宙观念、行为方式、价值系统，凝结成极其宝贵的、独到的哲学智慧。

我们的祖先创造的经典汗牛充栋，本书编用的原则是：把最重要、最有根源性、原创性与代表性，最应当让大学生把握或领悟的哲学资料，特别是把涉及到中国哲学智慧、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核心内容选进来。同时，为避免支离破碎，我们在选编时尽可能照顾到名著、名篇的完整性，以便我们完整地加以理解，避免断章取义。

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儒、释、道诸家有不同的理想境界，并力图在现世中实现。中国哲人有自己的终极信念、信仰，而且身体力行。中国哲人把宇宙看做是创造流行的、永恒变动的、开放的、交融互摄、有机联系的整体。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人、人性与终极的天道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它们是和谐的整体。人的创造精神即来源于文化流行、无穷无尽的宇宙生命。宇宙自然及其诸神灵与人之间，没有间隔。人在创造的活动中，也在修养身心的工夫中，把握真、善、美的价值，体验崇高的精神意境，卓然挺立于天壤之中，不断追求精神自我的完善和超越。儒家人文的价值理想和道德精神，道家、佛家放达、逍遥、解脱、开放的心灵，诸子百家的生存智慧与机智的论辩，都是人类最为宝贵的精神资源。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一、“国学”的起源	(1)
二、“国学”的发展	(3)
三、中医经典《内经》与国学典籍的关系	(6)
四、开设国学经典课程的意义	(9)
第二章 周 易	(10)
周易基本知识	(12)
一、爻	(12)
二、卦	(13)
三、传	(17)
经文选读	(17)
第三章 道家经典	(50)
《老子》选读	(51)
《庄子》选读	(68)
一、逍遥游	(68)
二、齐物论	(74)
三、胠篋	(80)
第四章 儒家经典	(87)
《论语》选读	(89)
一、论学	(89)
二、论仁	(94)
三、论君子	(99)
四、论政	(103)

五、孔子之形象·····	(106)
六、其他·····	(111)
《孟子》选读·····	(114)
一、论性善·····	(114)
二、论仁政·····	(121)
三、义利之辨·····	(126)
四、孟子之形象·····	(131)
五、其他·····	(136)
第五章 释家经典·····	(141)
《金刚经》选读·····	(143)
第一品、法会因由分·····	(143)
第二品、善现启请分·····	(144)
第三品、大乘正宗分·····	(146)
第五品、如理实见分·····	(148)
第十品、庄严净土分·····	(149)
第十八品、一体同观分·····	(150)
第二十一品、非说所说分·····	(152)
第二十三品、净心行善分·····	(153)
第三十二品、应化非真分·····	(154)
《坛经》选读·····	(156)
一、行由品第一(节选)·····	(156)
二、定慧品第四·····	(163)
第六章 兵家经典·····	(168)
《孙子兵法》选读·····	(171)
一、计篇·····	(171)
二、作战篇·····	(173)
三、谋攻篇·····	(174)
四、军形篇·····	(177)
五、势篇·····	(179)
六、虚实篇·····	(181)
七、军争篇·····	(183)
八、九变篇·····	(184)

九、行军篇	(186)
十、地形篇	(187)
十一、九地篇	(189)
十二、火攻篇	(190)
十三、用间篇	(191)
第七章 法家经典	(193)
《韩非子》选读	(195)
一、解老	(195)
二、八经·因情	(198)
三、定法	(199)
四、内储说上·七术·必罚	(202)
五、赏誉	(207)
六、说林	(210)
七、难势	(211)
第八章 杂家经典	(213)
《吕氏春秋》选读	(215)
一、本生	(215)
二、贵公	(219)
三、去私	(222)
四、贵生	(223)
五、用众	(226)
六、去尤	(228)
七、察今	(231)
八、察传	(234)
九、似顺	(236)
参考书目	(239)

第一章 绪 论

什么是“国学”，至今学术界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从开放、发展的视角看，“国学”包括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所有的传统学术文化，具有整体性、传承性、包容性与时代性，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与思维方式，其载体是在传统文化中影响较大的国学典籍。

一、“国学”的起源

“国学”同中华民族的兴起同步，有着上下数千年的发展史，是我们民族文明进步的结晶。“国学”的源头，可以上溯到中华文明发生的炎帝、黄帝时代乃至更遥远的文明初兴时期，但其直接源头，可以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的诸子之学算起。

发生在春秋战国之际的“百家争鸣”是我国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它奠定了“国学”的根基。“百家争鸣”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发生重大变革的产物。春秋战国之际，奴隶制走向崩溃，封建制走向兴起。当时“诸侯异政”，在思想上导致了“百家异说”，出现了学术思想领域的种种分歧。这种分歧，促成了“百家争鸣”学术思潮的出现。这里说的“百家”泛指当时学派之众。当时比较著名的学派，汉人司马谈将之归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汉书》的作者班固又在六家基础上，增加纵横家、小说家、农家、杂家，称为“十家”；在十家中，略去“小说家”，即称之为“九流”。无论是“九流”或“十家”，都从特定角度反映了当时学术争鸣的大势。

在先秦的“九流”或“十家”中，最有学术影响的学派，只有儒、墨、道、法四家。这四家都建构了较为完整的学术体系，且产生过较为广泛的学术影响。

（一）儒家学派

儒家的创始人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孔丘(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学界把尊奉与信仰孔子之道的学者称为“儒家”。在政治方面,儒家提倡“德治”、“仁政”、“王道”、“民本”以及“内圣外王”之术,具有伦理政治倾向;在道德教化方面,儒家强调仁义、礼乐、忠恕、诚信和“五伦”规范,以及自我修身等,具有礼教、德化的特征。孔丘死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卿)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到了西汉,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方针的确立,儒家学术开始在中国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受到历代王朝的高度重视而得到相应的发展。儒家的典籍主要有《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和《五经》(《易经》、《诗经》、《尚书》、《周礼》、《春秋》),后来又被增为《十三经》(除前《五经》外,还有《论语》、《孟子》、《礼记》、《孝经》、《仪礼》、《左传》、《公羊传》、《尔雅》)。这些经典,担负着传承儒学的使命,是研究儒学的必读之书而儒家学术对国学之影响的确极其深远。

（二）墨家学派

墨家的创始人是墨翟(约公元前468—前376年)。墨家是从儒家内部分化出来的一个学派。墨家学说,集中地代表了当时劳动者的阶级利益。其学说体系由“五项十事”所构成,即: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等等。墨子死后,“墨离为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韩非子·显学》),这反映了墨家学派后来分化与演进的情况。先秦以后,墨家学派的思想成果,多渗入儒、道等家的思想体系中,而该学派自身,则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走向终结。今存的墨家经典,主要有《墨子》一书,它是我们研究墨家的可信史料。

（三）道家学派

道家的创始人是春秋末年的老聃(约前576年—?)。相传,孔子曾向他请教过周礼,其年岁长于孔子。老聃学说的基本点是“贵柔”,道家登上学术殿堂,应当早于儒家。但是,到了战国前期(偏后),《老子》一书问世以后,道家学派才逐渐引起重视。《老子》一书,是道家学派的总纲领,全书约五千字,故又称《五千言》。它分上下两篇,上篇为《道经》,下篇为《德经》,故又有《道德经》之称。道家同其他学派比起来显得更加成熟、老练。《老子》的最高范畴是“道”,其开篇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道”既是世界万物形成发展的最后本体(如“道生万物”),又是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的集中体现(如“道法自然”、“反者道之动”等)。在政治策略方面,道家强调“无为而治”,提出“无为而无不为”。在伦理道德方面,道家追求朴实

无华、纯厚朴真的美德,主张“返璞归真”。道家在战国中后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战国中期的稷下道家学派和庄周学派以及战国末年黄老新道家学派,都从不同侧面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学说。西汉时期,由于黄老思潮的兴起,道家学术在汉初治国实践中得到了较好的发挥。先秦道家的经籍,主要有《老子》、《庄子》、《列子》、《文子》、《黄老帛书》等。

(四) 法家学派

法家发端较早。“法”是作为“礼”的辅助物而出现的。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在金属鼎上铸刑书,开了法治的先河。但法家真正登上政治舞台,当是战国中期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前338年)学说形成以后的事。商鞅继承发展了战国前期李悝、吴起的法治学说,高举变法的旗帜,主张“不贵义而贵法”、“任其力不任其德”,并明确反对“法古”、“修今”,认为“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商君书·更法》),提出“因世而为治,度俗而为法”。他的主张,得到了秦孝公的赏识,并在秦孝公支持下,于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在秦国实行变法,将其法治理论付诸政治实践。到了战国末年,韩非在法治理论上继续开拓,形成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体系,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今存的先秦法家著作,主要有《商君书》、《管子》中的相关篇章以及《韩非子》等。

春秋战国之际,儒、墨、道、法四大学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方面努力宣传自己的学术见解;另一方面,又在学术上与其他学派相对撞,以至出现了儒、墨、道、法诸家彼此碰撞、论辩、交锋的学术争鸣盛况,使各家各派经受洗礼和锻炼,从而逐渐走向成熟。因此,春秋战国之际的“百家争鸣”,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空前繁荣的学术思潮。在这一思潮中,先秦诸子所创造的学术成果,对尔后中国学术的演进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学术影响。先秦以降,中国学术虽随着时代的推移在不断变化发展,但万变不离其宗,我们总是可以到先秦诸子学说中找到思想源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先秦诸子之学看作“国学”之源。我们要把握“国学”,必须从源头上下工夫,也就是说,必须把探索的触角伸入到先秦“诸子”之学中,看先秦诸子是怎样为“国学”在后代的繁荣发展铺垫出深厚的学术根基的。

二、“国学”的发展

从秦汉到明、清,在这漫长的两千余年的历史过程中,思想家们(特别是儒家学者、道家学者以及后来的佛教学者)创造出形态各异、丰富多彩的学术思想成果,从而大大深化提高了“国学”的水平。如果说,先秦诸子之学是“国学”兴起的活水源头,那么,先秦以来,儒、道、佛等学派思想的演进,则构成了“国学”发展的三大干流。这三大干流催生出一系列前后相继的学术思潮,如汉初黄老思潮、两汉

尊儒思潮、东汉反神学思潮、汉魏道教思潮、魏晋玄学思潮、隋唐佛学思潮、宋明理学思潮,以及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等等,组合成“国学”发展演变的宏伟画面。

(一) 汉初黄老思潮

西汉王朝建立后,废弃法家,尊崇道家,催生出汉初的黄老思潮。这一思潮,是秦代法治苛政的对立物。它的出现,是为了医治秦代法治所造成的社会创伤,因而适应了民心思安、思治、思静的客观需要。顺应这一时代潮流,一批黄老学者应运而生。他们的代表人物有陆贾、刘安、河上公、严遵等。

(二) 两汉尊儒思潮

由于黄老之治的推行,使汉初得到几十年的内炼修养,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社会生机。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新的问题产生了:一是藩镇割据,加剧了地方和中央的矛盾;二是大地主阶级兼并土地,加剧了阶级矛盾;三是北方边境的匈奴入侵,造成社会动乱不安,加剧了民族矛盾。这些都提醒西汉统治者,黄老无为之治,已适应不了社会变动的需要,必须确立新的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启用儒学,董仲舒适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这一主张,很快被汉武帝所采纳,由此,促成了汉代的尊儒思潮。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贾谊、董仲舒、刘向、扬雄以及《白虎通义》的作者们。

(三) 两汉反神学思潮

两汉之际,思想界开始出现反神学思潮。这股思潮是对从董仲舒《春秋繁露》到班固《白虎通义》所推崇的神学世界观的回应。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桓谭、王充、王符、荀悦、仲长统等。

(四) 汉魏道教思潮

由于社会条件的催化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到了东汉中后期,我国的本土宗教——道教,已登上了历史舞台。它的标志是道教理论开始走向成熟以及道教团体的出现。当时,在理论上,出现了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和《老子想尔注》;在教团方面,有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或曰“天师道”以及张角创立的“太平道”。“道家”与“道教”,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属于学术派别,后者属于宗教派别。道家以学术导人,道教以信仰传人。但两者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说,道教经典主要是吸取黄老道家理论建构而成的。在思想理论方面,道教学者继承、发挥并改造了黄老道家的学说,将之引向宗教化。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在理论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在东汉后期,道教主要为劳动群众所信奉,具有反剥削、反压迫的倾向。到了魏晋时,由于一大批士族人物进入道教,改变了道教组织的阶级构成和文化素质。他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道教进行了一场重大变革。他们纷纷著

书立说,阐发教理,汇集道书,制定教规教义,建立起融道家哲理与道教信仰于一体的道教理论体系。在这一实践中,涌现出一批道教名士,其中主要有东晋道士葛洪(公元284~364年)、北魏道士寇谦之(公元365~448年)、南朝宋道士陆修静(公元406~477年)以及南朝齐梁道士陶弘景(公元456~536年)等。

(五) 魏晋玄学思潮

魏晋时期,玄学思潮风起云涌。从思维逻辑上来看,这一思潮,是对两汉神学思潮的否定;但它同两汉神学又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如果说,两汉神学的宗旨在于论证“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那么魏晋玄学的宗旨则在于引出“名教即是自然”的结论,二者在维护封建纲常名教方面有其一致性,只是论证的途径方法不同而已。“玄”,其源出于《老子》首章中的“玄之又玄”一语,含有深远、玄妙之意。玄学家在形式上复活了老庄思想,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祖述老庄立论”,且把《周易》、《老子》、《庄子》并称“三玄”,旨在综合儒道两家的思想资料,以熔铸成体现儒道兼宗思想特色的新的思想体系。玄学的发展,围绕自然与名教的关系进行理论探讨,先后出现三大学派:一是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派”;二是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任自然派”;三是以向秀、郭象为代表的“独化派”。

(六) 隋唐佛学思潮

佛教早在东汉明帝(公元58年~75年在位)时,即由印度传入中国。但是,由于它是外来宗教,开始时没有多大影响。后来,由于魏晋玄学的兴起,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概念、术语和玄学思维模式,为佛学翻译家实行“连类”、“格义”式地翻译佛经创造了条件。所以魏晋之后,佛经逐渐完成了意译的任务,而得以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并在中国生根发展。到隋唐时,即出现了佛学思潮。当时的佛教学者,多以印度大乘佛教“空宗”和“有宗”作为思想归依,各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证真如,入涅槃”,从而出现了一系列佛门宗派,以华严宗和禅宗影响最大,特别是禅宗,成为中国化佛教的突出典型,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独特地位。华严宗和禅宗等,均在佛学理论方面有自己的独特创造。

隋唐佛学思潮是我国历史上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它的兴起,不仅展示了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所具有的强烈生命力,而且从特定角度推进了中国本土学术。可以说,没有隋唐佛学,就没有后来的宋明理学。

(七) 宋明理学思潮

宋至明代,我国儒家学说得到了重大发展,其最突出的标志,是“宋明理学”(又称“宋明道学”)思潮的出现。“宋明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居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潮的出现,既有其社会政治方面的需要,又有其理论思维内在逻辑必然。“宋明理学”把儒、释、道三教学术成果融为一体,使其由互黜走向互补。

它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内容,以佛、道的修养原则和思辨逻辑为思想方法,因而是一种全新的思想体系。“宋明理学”以弘扬儒家纲常伦理为理论归宿,虽也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它围绕“理气”、“心物”、“道器”、“体用”等范畴所展开的具有相当深度的理论探讨,对推进中国哲学向更高境界攀登,确实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八) 明清之际启蒙思潮

明清之际启蒙思潮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一是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宋明理学”的传统观念,推动了当时社会的思想解放;二是表现出某些早期民主主义意识;三是主张吸收外来学术,透露出早期对外开放的观念;四是主张务实求治。这些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启蒙思想家学术思想的进步性。这不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着呼唤思想解放的积极作用,而且也对后来民主革命潮流的到来,起到了开风气的积极影响,其理论和现实意义都不可估量。

以上的八大思潮,前后相继,表现形式和展示的内容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同儒、道、佛三家学术紧密相关,或表现为三家之中一家的思维路向,或表现为三家之中两家或三家的思想会通,从而分别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展示了国学发展演变的丰富内涵及其在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其中,有进步的思想理念,也夹杂着落后的或封建的社会意识。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可以说,它总是同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大势相协调,总是服务和服从于相应的政治经济制度,并且总是伴随着社会文明进步的脚步迈向新的目标。

三、中医经典《内经》与国学典籍的关系

(一) 《内经》与《周易》

《周易》是我国古代说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运动和发展变化规律的一本哲学著作。《周易》与《内经》的关系十分密切,历来就受到许多医家的重视。唐代的孙思邈认为“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明代张景岳更是提出了“医易同源”论。《周易》主要在两个方面与《内经》发生联系:一是《内经》的基础理论直接来源于《周易》,二是《内经》吸取了《周易》的思维方法。

《内经》的全部理论都是建立在阴阳学说的基础之上,而阴阳学说又是来源于《周易》,《周易》将自然万物分为阴阳两大类,并且说明了阴阳之间相互消长、变化的动态平衡关系。《内经》的阴阳理论正是来源于此,如《素问·金匱真言论》:“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内经》中的另一重要理论“五行学说”的产生也是受到《周易》的启发。河图洛书认为“天一生

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这就是五行生成之数。河图之数的分布，配以方位，东南西北成四方形，再加上中央，便是五方，阴阳之气在这五个方位上运行，便是“五行”。空间的五行，配以时间上的四时（或五时），便成为时空合一的“五行学说”。《内经》发展了这一学说，用来说明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体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的原则。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内经》在汲取《周易》阴阳、五行理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汲取了《周易》认识事物的思维方法。《周易》运用直觉思维模式，将自然现象用“取类比象”的方法，分为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分别以“—”和“--”，即阳爻和阴爻两个符号来代表这两个对立的方面。并且认为事物的这两个相互对立的方面并不是静止不动的，总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彼此消长，互相转化。这种思维方法处处充满了辩证法思想。《周易》的基本特点可归纳为简易、变易和不易，都体现了它的直观思维模式和辩证法思想。简易，即万事万物都可化分到阴阳两个互相对立的范围内。变易，即阴阳两个对立面都处在一刻不停的运动变化之中。不易，即万物都有阴阳属性和阴阳不断运动变化且在对立运动中获得了统一，这个基本原理不变。《内经》也利用这种直觉思维模式来解释自然万物，说明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个方面。如《素问·五运行大论》说：“天地阴阳，不以数推，以象之谓。”而其描述阴阳的特征，也只是通过直观的观察进行描述，如“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内经》的这种不是靠严密的逻辑推理，而是靠直觉思维，用类比的方法来抽象地描述事物，正是受了《周易》的影响。《内经》吸取了《周易》的这些思想源泉，将阴阳作为构成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石，用它来说明自然的运动变化规律，说明人体生理、病理的运动变化规律，用来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阴阳的对立统一法则也成为中医理论的核心。《周易》阐述了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规律，是关于自然的一般理论，是人们认识自然的工具，而《内经》则是该理论在医学上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二）《内经》与道家思想

《内经》与道家思想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发生联系：

1.《内经》将道家的“精气”学说引进中医学，并进一步发展完善，用以说明精气是产生和构成万物的本源，并将精与气区分开来，认为气有两种含义：一指具有营养作用的精微物质；一指人体的生理功能或动力，即通过气的升降出入运动，来完成气化的功能。《内经》根据气的作用不同，将气分为真气、元气、营气、卫气、宗气、经络之气和五脏六腑之气等等。《内经》认为，精是一种由气所聚合化生而又与气有别的精粹物质，禀承于父母先身而有，又赖后天水谷精微的充养，

组成人体的主殖之精，以繁衍后代。

2.《内经》将道家的“道”的概念引进中医学，并将其内容具体化、单一化，专指规律。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素问·脉要精微论》：“持脉有道，虚静为保。”而道家的“道”作为其理论精髓，无所不包，不仅指规律，也指物质，容易引起混乱。而《内经》则以“道”代表规律，以气来代表物质。

3.《内经》将道家的“形神观”引进中医学。道家认为“神”是由“道”所直接派生出来的，而形体只不过是“神”所寄居的躯壳，强调“神”的绝对作用，割裂其与形体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内经》认为“形”和“神”都是由精气所化生的，“神”是在精气等物质基础上表现的生命活力和情志思维活动，对生命具有调控作用。形体不仅是“神”存在的场所，而且为“神”提供物质基础，两者相互为用，一旦形体消亡，“神”也就随之消失。《内经》的“形神观”更具有唯物主义色彩。

4.《内经》吸取了道家的养生学思想。《内经》不仅记载道家常用的导引、行气等气功养生方法，而且许多养生学思想也都是对古代道家养生思想的继承。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强调的“恬淡虚无，精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都带有浓厚的道家色彩。

（三）《内经》与儒家思想

《内经》在受到《周易》和道家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了儒家的学术思想的影响。《内经》主要吸取了儒家仁、礼和中庸思想。

仁，即爱人，对人、对物要充满仁爱之心，以人为本。《内经》重视病人的生命，强调医生对病人要有同情心，一切从病人的需要出发。如《素问·宝命全形论》：“天覆地载，万物俱备，莫贵于人。”《内经》作者编写本书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达到祛病、养生、延年的目的。

儒家强调礼，所谓礼就是维护封建社会的制度、仪节、习俗、道德等要求。主要表现在把社会上的人分为许多等级，地位低贱者要尊崇地位尊贵者，人们要维护正常的关系，不可逾越，否则就是乱了规矩、失去纲常。这种观念在《内经》中也有体现，《内经》根据“取类比象”的方法，将人体比做一个小社会，人体的脏器如同社会中的各个阶层的人物。如《素问·灵兰秘典论》：“心者，君主之官也……肺者，相傅之官……肝者，将军之官……胆者中正之官……膻中者，臣使之官……”同篇还说：“故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这些都是儒家“礼”的思想的体现。《内经》还以此来说明组方的原则，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说：“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

儒家思想中对《内经》影响最大的是中庸思想。中庸，即凡事要适可而止，不可不及，更不可太过，太过就会走向极端，甚至走向相反的方向。中庸思想实质就是动态的平衡观思想。该思想贯穿于《内经》的始终。如生理上，人要保持各部分的平衡，才能进行正常的生理活动。如：《素问·生气通天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素问·调经论》：“阴阳乃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病理上，一旦人体的各种平衡遭到破坏，就会产生各种疾病，如各种气候失常、饮食五味不当、情志失节、劳逸失调等都可导致疾病的发生。《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官，伤在五味。”所以在治疗上也就以恢复各种被破坏的平衡为目的。如《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在另一方面，治疗疾病也要把握适度的原则，否则就会产生新的不平衡。如《素问·五常政大论》：“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无使过之，伤其正也。”

四、开设国学经典课程的意义

“国学”在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对我们民族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道德取向、社会风气以及人民群众的人文素质，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而国学的载体就是一些经典的国学著作，将这些经典著作进行整理，开设出国学经典课程，其目的就是从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典籍中精选那些最具典型意义的文化经典作为传授内容，促使大学生阅读、熟悉和鉴赏经典，并深入地了解传统文化遗产，了解先人的思想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巨大影响。它是中国古代文学和传统文化的延伸，既有利于继承、传播优秀的文化遗产，也有利于培养青年一代的人文素养。

第二章 周易

《周易》历来被称为群经之首，与《黄帝内经》、《山海经》一起有三大奇书之称。《周易》与《黄帝内经》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浸润着华夏文化的根系，又向躯干以至枝叶渗透，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们以精湛深邃的辩证思维与象、数、理三个系统组成了独特的思想结构框架，闪耀着东方文明的智慧之光。《黄帝内经》侧重于对生命奥秘的探讨，而易学运用广泛，在社会中普及性广、对人们的影响大，故后世许多医家借易学之理来说明中医的一些问题，故有“医源于易”之说。到明、清时代的《景岳全书》、《医碥》中的命门学说、新方八阵、五脏配五行八卦等，无不显现《周易》对医学的巨大影响。因此，历代医家非常重视对《周易》的学习和应用，如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说：“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说明《周易》是一个中医的必修之课。

《周易》之名，首见于《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该书记载有许多用周易占卜的事例。

对于“易”的解释，有“日月为易”、“易简、变易、不易”、“有交易、变易之义”、筮书、主司占卜的官等不同的解释。“周”的解释有三：“周代”、“周普”、“周流，反复”，结合诸家认识，《周易》含义当为周代的占卜之书。

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卦象，卦名，卦辞，爻辞。卦辞和爻辞共四百五十条，四千九百多个字。传：《系辞》上下，《彖》上下，《象》上下，《文言》，《说卦》，《杂卦》，《序卦》，统称为十翼。《周易》在春秋战国没有“经”，汉·孟喜《易》分上下经。自西汉始称《周易》为《易经》，并把易传也作为经文，现在说《易经》一般指《周易》本经。

传说《周易》产生“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即先天八卦为伏羲所作，周文王作后天八卦、六十四卦，周公作爻辞，孔子作易传。客观地讲，《周易》是在积累以前经验的基础上，周末成书，其作者当主要是周王朝和列国中的一批掌占卜的卜、